

欠发达地区发展的“低水平均衡”及其突破

——川西 B 县乡村振兴的案例研究

杨再革 李棉管*

【摘要】乡村多样性现实和乡村振兴分类推进的政策要求，呼唤更为丰富的乡村类型研究。尽管“空心化”所导致的“乡村衰落”已经成为诸多乡村振兴研究的默认起点，但以 B 县为代表的“三区三州”地区可能会成为这一默认共识的“视野盲区”。这类地区在人口流动上呈现出明显的“域内流动”特征，而过往的区域发展阶段论或者“封闭说”无法很好地解释这种流动模式得以维持的原因及其对乡村发展的影响。B 县乡村振兴的现实背景是以人口“域内流动”为表征的“低水平均衡”发展陷阱，使得在“空心化语境”基础上建立的政策议程与该类乡村面临的首要困难不匹配：与“空心化”议题中“人的流失”相比，“低水平均衡”面对的是人口域内流动和低人力资本带来的负反馈问题。然而，B 县在合法性逻辑和内部效率的主导下，采取“情境性抽离”的做法推进乡村振兴，导致了“低水平均衡”的再生产。建议避免照搬“空心化”较强地区的做法，以嵌入性的政策实践来突破“低水平均衡”，并在充分考虑“人口在地化”优缺点的基础上统筹产业推进、公共服务和社会治理。

【关键词】乡村振兴 三区三州 低水平均衡 乡村衰落 人口流动

【中图分类号】D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2486 (2023) 05-0004-22

一、问题的提出

乡村振兴战略意味着以乡村为主阵地的新发展主义的回归，因为有形形色

* 杨再革，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通讯作者：李棉管，中山大学中国公共管理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感谢匿名评审专家和编辑部的宝贵建议。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脱贫地区乡村振兴战略的基层执行比较研究”（22BSH067）。

色的乡村，所以会有不同的乡村振兴路径。在中央政府层面上，政策一再强调乡村振兴要因地制宜和分类推进。2018年发布的《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提出，要“科学把握乡村的差异性和发展走势分化特征”。2021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乡村振兴促进法》也提到，要“顺应村庄发展规律，根据乡村的历史文化、发展现状、区位条件、资源禀赋、产业基础分类推进”。在政策执行的话语体系中，地方政府需要在中央原则性战略范围内结合本地实际进行个性化探索，只有如此才能真正实现因地制宜和分类推进，这也是全国范围内各种“示范点”“示范带”遍地开花的深层逻辑。然而，在具体的政策实施中，地方的乡村振兴实践在很大程度上呈现出趋同性和脸谱化特征。这种趋同背离了分类推进的要求，导致部分政策脱离本地情境，产生政策脱嵌。

这种脱嵌在欠发达地区更为明显，“三区三州”地区是其中的典型代表。该片区是我国脱贫攻坚时期的最后堡垒，也是新时期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以下简称“巩衔”）的难点地区。然而，无论在脱贫攻坚时期，还是乡村振兴时期，真正以这些深度贫困地区为对象的经验研究十分有限，体现出贫困研究中的“失焦特征”。在贫困治理实践上，这些地区也往往被视为治理经验推广的“客体”，用来自其他地区的经验来应对深度贫困地区的贫困治理（邢成举等，2019）和乡村振兴。事实上，特殊的自然和人文条件使得这些地区和其他地区存在重大区别。“空心化”常被视为乡村振兴的默认起点，然而，在以涉藏地区和南疆地区为代表的民族乡村（Holcombe，2017），其人口流动的核心特征是“域内流动”和“向内流动”^①（巫锡炜、毕忠鹏，2022）。这样一种特殊的人口流动模式导致的结果是“低水平均衡”（丁建军，2019），是一种与乡村“空心化”完全不同的发展状态。用“空心化及其后果”来描述这些乡村，套用通用的政策议程，将面临很高的失真风险。

来自甘孜藏族自治州（以下简称“甘孜州”）B县的经验调查显示，尽管地方政府将乡村振兴作为新时期“三农”工作的总抓手，也制定和实施了诸多的地方性政策，但B县乡村振兴的地方实践却导致了“低水平均衡”的再生产。本研究要回答的核心研究问题是：“低水平均衡”状态的产生机制是什么？为何以促进乡村发展目标的乡村振兴地方实践却导致了“低水平均衡”的再生产？如何才能突破“低水平均衡”，走向县域乡村振兴？

① “内”“外”划分的主要依据是人口是否在邻近区域和文化区域内流动，后文提到的转移就业、外出务工则指代长距离和跨文化区域的转移就业。

二、文献综述：“空心化”语境下的乡村振兴及其视野盲区

关于乡村发展特征和阶段的判断对乡村振兴战略的地方执行有着重要影响。乡村衰落是目前诸多乡村振兴政策的主流预设（杜姣，2022），这种预设主要基于普遍的“中西部地区农村”现状提炼而成。在城乡分隔的二元体制下，人口的单向流动，导致农村的“空心化”和落后衰败，这正是乡村振兴战略的核心关切。然而，“中西部地区农村”也存在内部分化，“空心化”预设的视野盲区决定了它无法解释边疆民族地区乡村振兴的特殊性。

（一）“空心化”与乡村衰败：乡村振兴的“默认起点”

乡村振兴是对农村衰落的现实观照（李长学，2018）。乡村的衰落和萧条是一个全球性问题，有学者甚至称之为全球现代化进程中的“铁律”（周立等，2018）。

乡村衰退的核心是生产要素流入流出的倒挂，其中人口流出导致的“空心化”既是乡村衰败的直观表现，也是乡村衰败其他表现的原因（姜德波、彭程，2017）。人的“空心化”并不是一种“匀质移出”，而表现为一种精英的出走。这使得农村产业发展面临困境（吴重庆、张慧鹏，2018；叶兴庆，2021），治理主体“空心化”和行动主体性缺失问题突出（刘祖云、张诚，2018）。而乡村文化衰败、生态治理难题等议题都与农村“空心化”，尤其是人口“空心化”高度相关（何慧丽，2012）。

在刘易斯二元理论的指导下，学界形成了人口城市化与农业规模化的双重想象。中国的乡村问题基本是伴随着城市化和工业化而来的（李长学，2018）。因此，乡村衰落语境无法回避城乡二元化及其特征中存在的关于乡村“问题”的“想象”。部分学者认为，走向西式的规模化农业或许是走出“空心化”困境的可选路径之一（姜德波、彭程，2017）；也有大量学者对西式规模农业的可行性进行了反思（黄宗智，2014；温铁军，2018），基于此也产生了相互交叉或者背离的乡村建设路径。

（二）“空心化”语境下乡村建设的政策路径

尽管诸多研究都持有“空心化”的预设（杜姣，2022），但学术界对“空心化”背景下的乡村建设却存在思路差异。总体来看，过往的研究可以归纳为两种视角：“解决空心化”和“利用空心化”。

1. “解决空心化”的视角

杨春华和姚逸苇(2021)将农村“空心化”拆解为“地理空间”“人口结构”“经济资源”三个层次。而“解决空心化”视角把“人口结构的空心化”作为最核心的问题。这一视角最为关注的,一是避免“空心化”带来的城乡差距及相关社会风险,二是对未来“空心化”逆转成本的担忧。前者如薛敏(2022)担忧的中等收入陷阱,即中低端产业大规模持续发展导致农村空巢现象与劳动力素质不高的情况并存,从而阻碍乡村单位要素产出的飞跃。后者如孙学立(2018)的担忧:未来谁来种地?老人农业可持续吗?因此,姜长云认为,要打破“人口流失——产业凋敝——发展能力低下”这种恶性循环,建立良性循环(魏后凯等,2021)。姜方炳(2018)认为,在这种背景下,促进人力资本回流是乡村振兴的头号问题。主要渠道包括乡村精英回流、乡村精英培育、外部精英输入三个路径(杜姣,2022)。学者们认为,返乡创业者兼具技术优势和社会网络优势(刘爱梅,2021;薛敏,2022),是乡村人力资本的主力军。而在乡村精英培育方面,主要是通过教育和农民培训的方式实现(魏后凯等,2021)。也有学者倡导“千方百计留住本地人”(刘爱梅,2021)以增加乡村人力资本的弹性。最后一类则是通过各类专才、干部下乡等方式充盈地方人力资源(魏后凯等,2021)。总体上,“解决空心化”视角对要素的纯自由流动持有悲观态度,强调通过政策干预引导包括人口在内的生产要素回流乡村。

2. “利用空心化”的视角

相比之下,另一类观点更加偏重于“经济资源的空心化”,关注耕地撂荒、粮食安全等生产层面的副作用,政策上强调进一步解除制度管制。朱光磊和裴新伟(2021)认为,人口“空心化”是舆论对青壮年劳动力转移的“过分担忧”。这一类观点将“人的空心化”视作转型中的自然过程(陈锡文,2018),以顺应土地集约化的要求,释放乡村资源。这一类观点通常出现在倡导发展规模农业、优化农村土地资源配置的论点中,并认为村庄“空心化”和农村衰败在短期内“是不可阻挡的”(贺雪峰,2020),城市化进程将依然持续相当一段时期。当然,这里的“城”在不同学者看来有不同的可能性,有的倾向于大城市化,有的更倾向于诸多分散的小城镇,前者的参照模板多是西方国家的城市化水平和产业分工模式(朱光磊、裴新伟,2021)。

应对“空心化”的两种观点并非截然对立,甚至一些学者会同时持有;但“利用空心化”视角在人的回流上有更明显的精英偏好,强调乡村作为生产空间的价值。希望继续放开户籍和乡村土地制度(叶兴庆,2021),促进市民化进程(朱光磊、裴新伟,2021)和农民职业化(王雅军、张波,2019)。叶兴庆等甚至认为,农民兼业化有诸多弊端,要消灭代际分工的兼业经营(叶兴庆、翁凝,

2018)。当然，也有学者持不同意见，认为利用西式理论理解中国城乡关系忽略了乡村发展的多样性可能（吴重庆、张慧鹏，2018），不能沿用“老三化”思路推进乡村振兴（萧洪恩，2022）。

（三）乡村衰落语境的视野盲区

“空心化”以及由此带来的乡村衰落因其发展阶段和特定背景而具有多样性（刘爱梅，2021），其视野盲区往往也内生于对当下“空心化”现实的解读中。主流的乡村“衰落语境”似乎难以很好地解释“三区三州”等地区在特殊人口流动模式下，以“低水平均衡”而非“衰退”为主的发展困境。这一类地区在具备一般乡村发展形态的同时，又在以下方面不符合“衰落语境”下的种种预设。

其一是人口流动。有学者已经注意到“空心化”并非所有村庄的常态，在以涉藏地区和南疆地区为代表的民族乡村存在着人口的“域内流动”特征（Holcombe，2017；巫锡炜、毕忠鹏，2022）。其二是“空心化”问题。虽然部分边缘乡村已经有“空心化”趋势，但因生计的季节性整合方式使得大部分乡村并不存在常年的“空房”“空人”问题，聚落形态上的“空心化”不明显（乔家君等，2011）。反倒是政府主动推动易地搬迁，完成人口的集中化。其三是受民族文化和社群认同影响，人们对乡村空间所承载的“非物质”资产有更大的需求。其四是特殊的人口流动模式使得大量农民聚集在有限的产业领域，呈现出过密化特征，多重兼业化成为最理性的应对策略（郑长德，2020）。

长期以来，对“三区三州”乡村的理解具有一定的阶段性、程式化思维。这种理解预设这类地区未来也会进入中西部地区农村曾经的人口远距离务工阶段，不少地区还试图用行政手段推动这一进程，将不外出务工定义为“落后的观念”。然而，这种线性思维一是忽略了区域发展差距急速扩大在个体生命周期上产生的堆叠效应，二是忽略了社群文化特质。最终遮蔽了真正值得关注的问题：即，既有人力资本水平下人们“外出不经济”和“在地发展空间受限”并存之间的矛盾。换句话说，无论是解决“空心化”还是利用“空心化”，可能都不是该地区的主要课题。同样是“人”的问题，“低水平均衡”面对的是人口域内流动和低人力资本带来的负反馈问题。遗憾的是，主流的乡村发展认知多源于“衰落”和“空心化”预设，这类地区的特殊人口流动模式在以往被更多地用区域发展阶段论或者“封闭说”来解释。因此，急需更多对该类区域乡村特征的研究。

三、走进 B 县：研究设计与案例描述

（一）研究设计

B 县所在的甘孜州是原 14 个连片特困地区之一和“三区三州”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选取 B 县作为研究对象之前，笔者已经在 2018 年 8 月和 2021 年 2 月对四川西部的 5 个民族县（市）进行了广泛的考察。选择 B 县是因其具有该区域典型的民族结构，尽管具备人口外流的区位条件，但人口“域内流动”特征仍然明显，能够较好地反映该类区域当下和未来的状态。

调研于 2022 年 8 月 5 日—10 月 4 日开展。综合使用了参与式观察、访谈和文本资料分析方法。文本资料主要是档案、文书、新闻、统计信息等，共 100 余份，以及观察日记 2 万余字。参与式观察是以实习生身份观察和参与政府的日常工作和会议；访谈对象包括 16 位政府工作人员（编码：农牧局 - N、人社局 - R、自然资源局 - Z 和乡村振兴局 - X、两个乡镇 - L）、9 位村民（离县城由远到近编码 - PA/PB/PC）、3 名企业主（编码 Q）。并在调研间隙随机通过和有关人员非正式访谈的方式交叉佐证信息。与政府人员除进行一对一访谈外，还开展了一次乡村振兴主题的焦点小组会议。对政府人员的访谈分多次完成，按照对问题认识的深入程度，不断追加回访，符合“观察——疑问——访谈——再观察”循环的认知规律。

（二）案例描述

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甘孜州共有常住人口 110 万余人，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 7.2 人，乡村人口占 68.99%，少数民族人口占 82.9%，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 6.89 年。《甘孜州 2021 年统计公报》显示，常住人口中省内流动人口为 23 万余人（占 89.5%）。全州 18 个县全部被纳入国家级/省级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是全省帮扶县最多的地区。B 县属于省级重点帮扶县，地处横断山区，垂直地貌明显，耕地细碎化，各类地质灾害隐患多，乡村人口占 70%，常住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 9 年。域内除了矿产和水电资源外，还包括虫草、松茸等采集业资源，粮食作物以玉米、小麦、土豆为主，经济作物以花椒、苹果为主。域内有多个 AAAA 和 AAA 级旅游景区，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约 1.5 万元，人均生活消费支出 1 万元。^①

^① 信息来自当地政府工作报告及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因研究伦理需要做了一定的模糊化处理，应不影响文章结论。

虽然 B 县于 2019 年正式通过脱贫验收，但因被纳入甘孜州“大渡河流域乡村振兴示范区”建设，乡村振兴工作早在 2018 年 5 月便开始展开。B 县选择了若干个传统文旅村庄，从基础设施、美化提升、产业基地等多个方面进行打造。2020 年脱贫攻坚工作顺利收官后，在新的政策周期下，各“条条”部门对各自领域的“示范区”建设任务进行层层下达。“全域旅游示范区”“传统村落集中连片保护利用示范”“乡村振兴双百工程”“乡村治理示范村镇”等各类试点项目百花齐放。由于生态的脆弱性，发展对生态环境影响较小的旅游业成为该州的战略选择。因此，在“块块”层面，政府提出要“优先”发展文旅，以“以全域旅游统揽经济社会发展”，与文旅优先发展战略契合并有资金配套的项目由此得到了更多的重视。2021 年，该县乡村振兴局才正式成立，受脱贫攻坚时期制度惯性的影响，乡村振兴工作从纵向“条条”上下压并归口于该部门。在地方，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农委、农牧以及乡村振兴局之间的业务协作和分工不甚明晰，使得总体的“衔接”工作在地方呈现出以纵向制度安排为主导的碎片化部门执行特征，未形成确切的地方整体性治理思路。遗憾的是，新政策周期初始阶段的“混沌”使得本案例故事本身缺乏紧凑性，但或许这种松散本身就是这类地区县域治理的常态。

四、“低水平均衡”：B 县乡村振兴的现实背景

在对“三区三州”问题的讨论中，近几年的研究普遍认可其处于某种形式的贫困陷阱中（李小云，2018）。丁建军等（2019）认为，对深度贫困地区的研究依然不足，从而很难廓清一般贫困和深度贫困的差别，并给出了“人、业、地”互构耦合形成“低水平生存性均衡”的解释逻辑。郑长德（2020）引入了分形贫困陷阱（fractal poverty traps）理论，认为这一类地区居民、企业和政府在多个分析尺度上同时处于低水平均衡状态，不同层面的贫困表现出各自相似的特点，并通过反馈效应自我强化。也有少数学者认为，后发地区“并未出现贫困陷阱”，属于“贫而不困”（王志章、杨志红，2021）。本文恰恰认为后发地区虽在强力的外部资源注入下摆脱了绝对贫困，但自我维持的低水平均衡并未被打破，属于“困而不贫”。本文以丁建军（2019）和郑长德（2020）等学者的研究为基础，侧重人力资本角度，从“人、业、治”三个层面建立分析框架，以 B 县的例子解释“低水平均衡”状态的维持机制。

如图 1 所示，居民、企业和政府等代理主体的选择从“根本上往往是他们

所赖以生存的社会结构和社会生活方式所影响的结果”（李汉林等，2005）^①。在动态上，个体本身的选择又或改造、或维持、或强化既有环境。因此，低水平均衡状态从静态上首先取决于自然环境和当时的外部制度条件，而在动态上则取决于人们在与制度、环境博弈过程中塑造的新反馈是否有助于突破“低水平均衡”自我复制和强化的循环。“低水平均衡”与“内卷化”现象有一定的相似之处，又不尽相同。尽管关于“内卷化”（involution）的内涵及其应用价值还存在争议，但是从 Geertz Clifford 到黄宗智，“内卷化”一般是指在边界被锁定情况下的重复投入所带来的“有增长而无发展”的现象（刘世定、邱泽奇，2004）。“低水平均衡”确实也反映了边界拓展受限背景下的区域状况，但它更强调这种背景下各种生产要素之间所呈现出的均衡状态，及由这种均衡所带来的自我强化和死循环（doom loop）状态（李汉林等，200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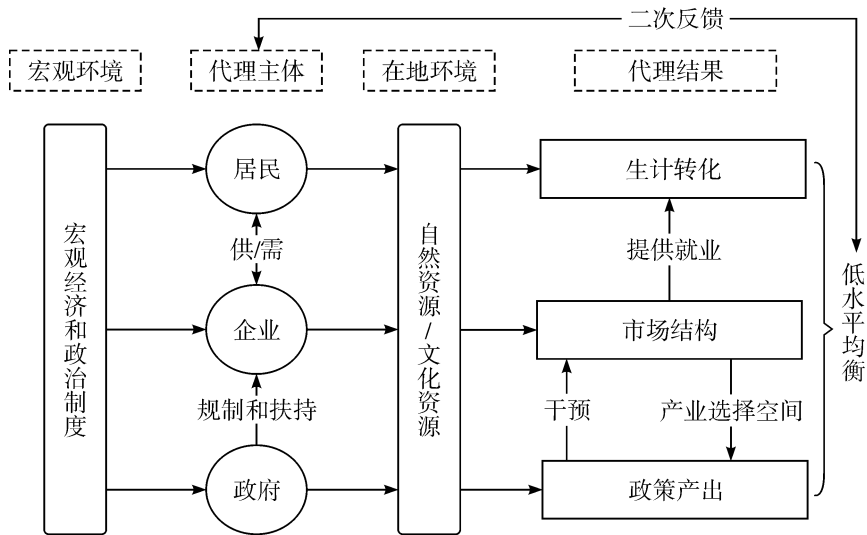


图1 B县“低水平均衡”的分形特征及生成机制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低水平均衡”的发生逻辑决定了突破“低水平均衡”走向“高水平均衡”有两种路径值得思考。一是打破边界锁定，实现生产要素的跨边界流动；二是内部创新，改变生产要素的低水平状态。县域乡村振兴为实现以上路径提供了新的可能性。下文将分别从人口流动、产业以及政府治理角度一窥这种“低水平均衡”在B县的具体表现。

^① 作者引用了 Karl Polanyi 的《作为制度过程的经济》中对于嵌入性解释的内容。

（一）人口流动及就业层面的“低水平均衡”

如图1所示，居民受其所在社区和文化的影响，并依赖在地环境转化生计；在不通过“流出”方式跳出区域生计结构的情况下，一定时期内在地资源的转化潜力决定了其收入水平的上限。根据2022年第一季度的统计数据，B县经常性在外流动的5600余人中，48%在县内就业和流动，30%在州内流动，只有5%在省外非文化区流动^①。这意味着通过“流出”跳脱出区域结构性环境的可能性较小。

那么，为什么转移就业在有的地方能够成功，在这个地方会失败？一般性的解释是教育和文化导致的自我封闭性使其无法适应外出务工进行价值变现（邢成举等，2019）。然而，早在2000年到2010年左右，B县的不同地区都出现了远距离务工人口。如访谈对象PA3去广东务工，几乎在同一时间，PB2和PC2都同时报告了同龄人去内地和沿海务工，但此后并未形成远距离的务工潮。马戎（2013）也提到了这一趋势，这意味着“自我封闭说”并不完全成立。本文认为，在地资源水平、社区社会资本、开发性政策等是重要的替代/补充性解释。

首先，在地资源的综合收益较高，农户可以用多重兼业化和重复改变生计整合结构的方式来适应区域内的生存资源竞争，降低了远距离流动的吸引力。

成都工地上……就几个月，后头回来拉苹果，挣钱差不多，但松活。浙江（和朋友）也去了一年，过了年就不想去了……整一圈下来差不多，而且老人还没有人照应。后头开始跑车，一年六七万……后头在关外（牧区）^②开了半年面馆，再后头修民宿就回来了（一起打工的现在做什么？）有的考起工作了嘛。在关外的……多，外头去的少。（PC2）

从受访者提供的信息来看，远距离务工的“性价比”是首要考量。除此之外，当地人（尤其男性）对“打工”（相对固定的全年工）有一定的排斥，有较强的创业热情。

看哪个生意好做嘛，啥子挣钱就做啥子。（PB4）

从来没想过要打工，都是做生意，打工那些都是小钱。（Q01）

两位受访者所在村为边缘村，人们很早就开始做小生意，PB4有一个妹妹在牧区某县当警察，他便到那边开饭馆。类似的亲属进入周边县工作进而带亲戚务工经商是早期人们流出的主要渠道，后期的流动也维持着这一惯性。此外，特产价格上涨也抑制了人们的外流意愿，如一级市场的冬虫夏草从1995年2000

^① 省外非文化区指除开涉藏区/州/县以外的地方。季节性流动人口数量更多，此处上报的数据是经常性在外流动的户籍人口，按照回访，略有遗漏，但总体符合实际情况。

^② 当地人将康定以西、马尔康以北的涉藏地区腹地，特别是牧区称为“关外”。

元左右/公斤上涨到近 20 万元/公斤（尕丹才让、李忠民，2012），部分主产区虫草收入甚至能占据农牧民年度总收入的 50%（王立明、冶生梅，2016），类似的还有松茸等。尽管在地资源丰富，但面对激烈的内部竞争，人们不得不用多重兼业化来提高总收入。以受访者 PA1 为例，其在一年内先是在家春耕，4 月开始上山挖虫草，结束后寻找修房子、挖水井等工作机会，8 月回乡摘花椒和收割，之后还会继续外出寻找季节性就业机会。其妻子除了带小孩，还在超市务工并兼顾家中花椒的采摘。

其次，社区社会资本也是重要的在地资源之一。社会资本的经营能够制造丰富的公共产品，减缓商品化进程，提高人们对货币贫困的忍耐度。以典型的修建房屋为例，直到现在大部分地区还保留着换工互助的建房模式。

全部要相互帮忙嘛，冬天就基本上是到处帮到修房子……有时候换过去换过来都不晓得还没还清了，但就是走不脱。（PC1）

PC1 还报告，婚丧嫁娶、农忙等都离不开村庄其他人的支持。这意味着长时间脱离这样的互助网络，会损失诸多的社区福利供给。

最后，文旅发展、牧民定居、基础设施建设和交通的便利化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当地居民的就业机会，兼业化水平进一步提高。总的来说，“封闭”性并不总是劳动力不转移的原因，在本文的案例里它作为结果存在。人们对在地资源的极致利用对脱贫攻坚的成功起到了重要作用，但长远来说，也抑制了技术和知识的跨区域迁移^①速度，农民聚集在有限的在地资源上，其导致的“过密化”让人们难以摆脱“低水平均衡”状态。

（二）产业的“低水平均衡”

如图 1 所示，面对在地资源的限制和市场空间的匮乏，企业或者创业者可以通过流出（法人实体或者产品流出）来突破结构性约束。然而在 B 县，经营主体和人口的域内流动呈现出“同形特征”，同业竞争明显。总体上，本土的各类经营主体主要集中在中低端产业领域，涉足的行业严重依赖周边人的示范效应和自身的技术禀赋，技术和知识缺乏使其总体上更倾向于前往比本区域更为落后的地区扩展业务，而非前往发达地区。因此，低门槛创业领域颇受欢迎，A 区域更是有两个村以“饭馆村”和“理发村”闻名。相比外部工业品的大量涌入，本地工业品的销路有限，这进一步抑制了加工业的发展。资本雄厚的传统企业则因占有着稳定的垄断利益（如房地产）难有动力投入新业态。理论上，虚拟文化产品可以克服地理要素的制约，但因为这一产业往往并非上级文件认

^① 此处以及后文中使用的“迁移”概念指的是以人口流动为载体的，技术和知识从务工工地到家乡的跨区域传播过程，强调这种传播的非连续性特征。

可的“产业”范围，使其在地方财政也无余力的情况下只能自发生长。也因此，在企业不“流出”的情况下，可利用的在地资源和市场决定了其发展具有明显的“天花板”^①。从这里，似乎能看到薛敏（2022）提到的“中等收入陷阱”在局部的出现。

这也反映在宏观经济指标上。B县所在州在党的十八大以后，经济和社会民生指标持续改善。但在区域中的发展位置相对固化，GDP总量、人均民营经济增加值、农村居民人均收入均列倒数第一，其他指标仅有微小改进。8年间产业结构调整缓慢，第一产业就业人数下降不明显，第三产业就业人数增加缓慢，第二产业就业人员甚至出现了小幅下跌（见表1）。地方政府创造财政收入的能力有所增强，但民营经济的发展水平依然垫底。在这样的背景下，当前的脱贫依然是低水平的（何秀荣，2018）。

表1 甘孜州2012—2020年部分指标相对排位（21市/州）

年份	GDP		就业占比			人均民营经	人均税收	农村居民
	总量	人均（元）	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	济增加值	收入	人均收入
	（亿元）/排名	/排名	（%）	（%）	（%）	（元）/排名	（元）/排名	（元）/排名
2012	175/21	15753/20	76.98	4.56	18.46	7709/21	1230/10	4610/21
2016	230/21	19596/20	72.82	3.12	24.06	8988/21	1811/5	9367/21
2020	411/21	36993/18	70.84	2.99	26.20	16529/21	2282/8	13967/21
增量	236/0	21240/+3	-6.14	-1.57	7.74	8820/0	1052/+2	9357/0

注：三产就业占比为2013年数据，人均数据按年末常住人口计算。

资料来源：《四川省统计年鉴》。

（三）治理的“低水平均衡”

如图1所示，对于单一制国家，上级政府和整体的制度安排对地方政府行为具有决定性影响，其对企业的规制和扶持、对在地资源的利用和改造往往受到上级政策导向以及自身治理资源的影响。这使得欠发达地区政府政策创新往往以层级扩散和对发达地区的跟进和学习为主（王浦劬、赖先进，2013），自身推动自下而上政策变革的能力较弱，最终使其更多地成为一个命令执行式的政府。

你想一下嘛，政策在省一级层面都是研究生水平的制定的，到下面的落实都是专科生，你就想嘛，差不多噻。（Z01）^②

正如干部Z01提到的，基层往往面临着治理需求和治理能力的倒挂困境，

① 也有少数企业流出（产品），但占比不高，初级农产品是主要的流出形式。

② 这一说法虽略显绝对，但也反映了现实中基层执行能力不足的困境。

在社会发展复杂程度加深的时代更是如此。

在乡镇和村庄层面则呈现出两种差异形态。一种是强势乡村和其所属的政府，因为需要广泛的层级互动和政民互动，往往有着相对活跃的微型政策创新动机和取向。而另一种则是大多数的一般村镇，其与民间以及层级间的互动更加符合一般分析中对“悬浮型”乡镇政权（周飞舟，2006）和“看守型”村级组织（肖唐镖，2006）的定位。而强势村庄的一些互动经验往往短期内难以转化为正式制度，因为在反复试点和“垒大户”的倾向下，区域内部差距已经使其失去了制度化转化的基础。这种内部差距又使得其他地区因为历史欠债导致发展成本更高而被持续边缘化，形成恶性循环。在乡镇和村庄层面，因为人口和辖区面积的倒挂，客观上降低了服务供给的规模化效应。除此之外，有限的注意力资源还容易被分散到应急、防灾、防疫、社会稳定等“性命攸关”的领域。

回到图1，因代理主体行动空间面临多重约束，最终形成了社区、市场和政府三个层面上趋于同形的“低水平均衡”状态，任何低强度的干预、小单位局部改进都难以超越“阈值”从而改变其稳态结构。对于个人和创业者而言，若基于理性考量选择留在区域内，则自动嵌入制度和在地环境中，从而使得个体努力无法超越结构性制约。皮凯蒂（2014）指出，技术和理念转移对整体生产率的增长和国内不平等的削减起着关键性的作用，而域内流动模式阻断了通过人的跨区域流动学习知识和扩展社会网络的可能——这对于教育欠债的欠发达地区至关重要。最终使得产业，特别是文旅这类中高端消费者导向型的行业无法实现转型升级。

那么，当下乡村振兴政策是如何回应“人、业、治”三个层面的“低水平均衡”的呢？下文将围绕这几个层面的政策进行分析，重点考察“治”是如何干预和服务“人和业”并与之产生同形特征的。

五、“低水平均衡”的再生产：地方政府的乡村振兴

（一）B县的乡村振兴政策支持框架

由于区域生态禀赋，甘孜州成为全国率先提出发展全域旅游的区域之一，确定了优先发展旅游产业的导向。文旅产业的丰富内涵能够适应新农村建设、新型城镇化、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等各类政策议题，让地方在急剧变化的内外环境中找到一个相对一贯的政策目标。在此背景下，B县自脱贫攻坚以来与乡村发展相关的主要政策格局如图2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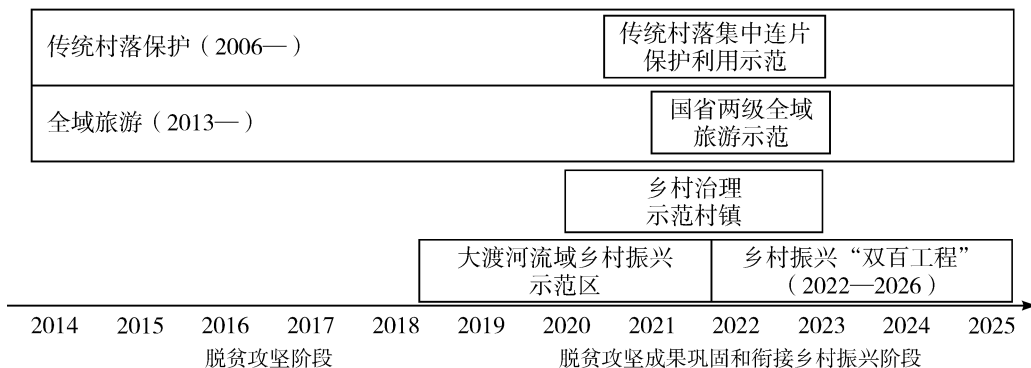


图2 B县主要与乡村振兴关联的政策设计

资料来源：甘孜州人民政府网站、政府内部文件、B县宣传公众号。

从2018年5月开始，甘孜州率先在发展基础相对较好的B县等三县（市）开展了为期三年的乡村振兴试点，共完成了102个示范村的建设。试点的核心依然是文旅主导，产生了村庄组团发展开发，总结出“目的地型、城镇依托型、景区依托型”三类旅游差异化服务的试点经验。但这一时期的试点基本建立在域内已经具有较好发展基础的村庄上，且以康养休闲旅游为主，村民普遍面临着理念、服务模式以及宣传营销方面的短板（其实就是人的“低水平均衡”的外在表现）。为解决这一问题，政府通过多种政策进行干预，如开展相关培训、运用“合作社+农户+（国资）公司”模式进行统一管理，以及扶贫产品代销等。

2020年后，B县全面进入“巩衔”阶段。这一阶段涉及乡村振兴的主要工作包括了文旅部门主推的全域旅游，住建部门主推的传统村落保护，农牧主推的“双百工程”，乡村振兴部门的防返贫监测和帮扶、乡村治理示范项目等。其中，按照《甘孜州乡村振兴“双百工程”建设实施方案（征求意见稿）》，“双百工程”指的是2022—2026年间在全州高质量建设乡村振兴示范村100个，重点打造精品村100个。B县先期确定了十余个乡村振兴重点村，与其他示范项目集中在几个传统的优势乡村不同，首批重点扶持村庄扩展到了其他具有一定发展潜力的边缘村庄。但遗憾的是，由于“巩衔”缓冲期、疫情等因素的影响，目前工作重心依然是巩固脱贫成果。总体上，因为州一级政府和纵向垂直部门对乡村振兴的目标设定权、检查验收权、激励分配权的掌控（周雪光、练宏，2012），使得下级政府更多是按规则行事，直控式特征明显（陈家建，2022）。这也使得当前阶段的乡村振兴工作在县级层面统筹性不强，呈现部门和事务上的碎片化特征。因此，这里利用访谈和各类政策文本回溯大渡河流域乡村振兴示范区建设中B县的做法，以各层级巡察组督察出的问题、各类指标考核的结

果和对应整改情况为重要补充^①，综合考察政策对区域低水平均衡状态的干预情况。

（二）“低水平均衡”的多维度干预“失败”

1. 培训效果低

人口，或者人力资本层面的政策干预工具包括教育、培训和转移就业。但教育受“条条”体系影响较大，短期内往往难以成为地方行之有效的干预渠道，培训和转移就业等成为主要的政策干预工具。而我国就业保障体系本身相对落后，对应的就业培训专业化程度较低，这使得在欠发达地区和移民安置区的各类就业培训往往更为粗放。在B县及其周边县市，就业创业培训包括了理发、汽修、烹饪等内容，但绝大多数都是当地人本身就有渠道自学的技术；一周甚至仅仅两三天的培训时长也难以使民众在短时间内获得实质性的技术，最终只能靠一些补贴吸引民众（R01）。

（巡察组）谈话（后）反映群众接受培训意愿普遍不强，参与培训人员主动接受新知识的能力不足，存在“挣补贴”的思想，通过培训真正掌握种植等技术的群众较少。（中共B县县委关于巡察整改阶段性进展情况的通报，2021）

致富带头人的培训也是如此，其中某次培训共6天，但内容却大包大揽地涵盖了创业流程及方法、旅游产品开发、电子商务、蔬菜种植、果树嫁接、养殖等内容，一门课仅1天时间，实际效果不足。

在为期三年的试点中，B县遇到的最大外部机遇应该是各类文旅乡村建设的热潮遇上网红“丁真现象”所带来的放大效应。在三年疫情期间，大量民宿投入建设，本地网络红人开始全面进军短视频赛道。互联网空间对地理禀赋价值和文化的重构，也为“低水平均衡”状态提供了结构性突变的可能。政府对这类真实需求的及时捕捉使得相关的培训和资源引入变得更接地气，如民宿规范化培训、网络直播培训等。局部的成功带来的启示是：民众需求的“可见程度”显然能够提高政府回应的针对性。

2. 转移就业难度高

除了培训，劳动力向发达地区转移也是人们学习新技术的重要渠道。虽然包括B县在内的广大欠发达地区认识到了劳动力转移的必要性，但转移就业的政策目标主要是增收而非促进技术迁移。

^① 由于田野调查具有短期性的局限，加之业务进入有一定的门槛，专业的督查团队出具的督察整改函能够弥补田野调查面和时间上的缺陷。

上节提到了人口域内流动本身是民众的一种理性选择，若没有相当高的边际收益，转移就业的难度非常大。当地人社部门在工作汇报中也总结道：“就业技能培训需求单一，农村劳动力不愿离乡，劳务输出难度较大。”矛盾的是，这类前贫困县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存在低估农民收入的动机以获得贫困县的“帽子”，当脱贫攻坚时期收入计算中的“水分”被挤出后，进入“巩衔”阶段的增收目标无疑具有更强的刚性。加之收入必须农民签字认可，这使得地方颇感“头痛”。随之而来的是公益岗位的扩张和尽可能多算收入来应对上级下达的、可能根本不符合“低水平均衡”阶段收入增长规律的增收目标。基层也有较强的动机通过减少新增“监测户”的数量来规避日后面临的增收和帮扶压力，提高了民众返贫风险。

现在就是尽可能多算（收入）……监测户要签字……想要隐瞒，就一点一点问，比如老年人他们分家的娃娃不可能不给钱……算不上来的话这些都要问。打工的最好算了。（X01）

越往后越难达到的增收目标、民众低下的外出就业愿意，以及本地产业发展困境似乎成为一个死结。

3. 产业创新和转型政策悬浮

当民间主体难以实现产业转型升级时，除了诉诸国有企业、村“两委”（指村党支部委员会和村民委员会）等泛体制力量外，官僚精英倾向于向外寻求答案。“必须引进专业平台公司来运营管理”（杨林，2020）成为百姓市场能力不足的另一味解药。相比之下，外部引入的市场力量和本地从事小工商业的创业主体因其市场化导向明显，更容易和科层产生距离；在这之中，外部力量成为政府的“拉拢对象”，而本地小工商业者则倾向于被排斥。

（我们）做真正的市场，但县上对我们还是不满意……他们想要建观光、综合体啊……政府形象嘛。我们的认知是有了市场之后，（就业、收入等）一切都能解决了。这中间我们很痛苦，并不是清高不和政府（配合）。

（就）我们的观点来说，在市场中站稳脚跟才是目标。（Q02）

从这里可以看出，市场导向的企业注重遵循市场规律而非迎合政绩目标。这使得政府往往有更强动机将资源倾向于更容易掌控的国企和村“两委”主导的产业。它们往往深度参与了政府绩效合法性建构过程，但市场目标和政府绩效目标并不是总能找到平衡点。如B县主推的某农产品的销售环节高度依赖政府，而销售是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是政府最不能代替的；但在短期目标的驱使下，双方一个愿打一个愿挨，最终政府短期支持与长效规划呈现出悬浮特征。除此之外，政府和集体组织往往把基础设施建设领域的项目制思维引入产业政策中，导致投机主义风险陡然增加。

他们就是项目的逻辑，不一样，和市场，那个是一次性搞完。外头（的政府）是你达到什么要求，我给你什么政策，这里就是你申请项目，拿到钱就干，拿不到就不干。（Q02）

正是因为这种项目制思维背离市场规律，使得诸多的产业项目缺乏可持续性的规划。长远来看，产业创新和转型政策悬浮于市场，可能非但无法帮助地区走出“低水平均衡”的发展状态，甚至在某些方面“越俎代庖”产生的“挤出效应”反而会阻碍市场发育。

（三）合法性机制与内部效率：“低水平均衡”的再生产机制

在图1的框架中，对于“治”的关注点有两个层次，一个是政府和居民、企业及在地资源的互动；另一个是宏观的制度环境，也就是代理结构和内部权力的安排。陈家建（2022）提到，当下分析政府组织行为时“控制权”理论具有较强的解释力，但其不足之处是容易忽略地方的治理资源约束。除此之外，相比于居民和企业，政府代理主体没有退出路径，就算是“应付”也必须“完成”政策任务。所以，无论是在控制权宽松的产业领域，还是在控制权上收的贫困监测和帮扶领域，政府行为都呈现出某种趋同性，这种趋同性逐步将地方拉出本地情境。

新制度学派的开创性文献往往把制度逻辑和技术效率并列（田凯等，2020）。按照Meyer和Rowan（1977）的观点，与技术生产和交流需求的组织相比，为了改善生存前景，科层组织往往与制度环境的“神话（myths）”同构，并与正在进行的活动分离，这种分离往往产生内部效率而损失外部效率。在制度结构和治理资源的双重约束下，合法性来源和内部效率的双重考量导致了B县的政策选择呈现出多重逻辑下的趋同，压缩了政府制定有利于打破“低水平均衡”状态的政策空间。

1. 政策议程与强制性趋同

目标设置、考核验收、激励分配三个环节共同强化了政策议程的趋同性。首先，在政策制定层面，中央政府为限制专项资金的滥用往往只在具体的产业类型选择上给予一定的灵活空间。其次，在实际的政策解释中，还存在把上级文件中的例举事项直接作为政策工具或者目标从而规避风险的行为。例如，州级部门巡查中提到的“（县级）部门衔接政策制定照搬照抄，未结合当地实际细化优化”^①，或者直接将文件转发乡镇来释放压力。而当乡镇真的试图对政策进行操作化的时候，反而发现上级部门也无法准确解读文件。最后，在技术治理

^① 摘录自州一级政府部门的督察整改意见。

趋势下，上级高度依赖各类检查和评估，并且伴随着强大的问责压力（李棉管，2019）；而这些检查和评估本身也构成了强制性趋同的重要因素，对量化指标的检查 and 反馈力度也加剧了治理绩效的内卷化，剥夺了其他非量化领域的政策注意力，增加了政策的情境性抽离风险。

2. 精英吸纳与规范性趋同

规范性趋同指的是因为人们由于相似的专业背景和决策方式导致组织的趋同（田凯，2020）。由于区域内市场发育水平较低，体制内的工作机会对人才产生了虹吸效应。这降低了市场中人力资本的水平，大学生的专业选择亲体制、一毕业就进入体制等因素也使得其在行为取向上产生趋同，不少企业抱怨本地大学生员工无法踏实做事，总是在准备考试。此时，当区域发展强烈需要培育市场的时候，类似背景的人本身并未成长于亲市场的环境中，导致地方官员市场意识相对缺乏。最终，人口域内流动模式不仅限制了民间主体从发达地区带来技术和知识迁移的可能性，还使得政府的人力资源也呈现出同形状态，最终形塑了组织的心智构念（mental constructs）。

3. 产业选择与模仿性趋同

迪马久和鲍威尔认为，在技术、目标、环境或解决方案具有不确定性的情况下，模仿行为更容易发生（田凯，2020）。在产业上，除了州级、县级政府区域性规划带来的规范性趋同外，其趋同倾向还受到另外两个因素的影响：一个是在相似资源禀赋地区取得成功的产业很容易扩散和被学习，另一个是既往产业类型。可以看出，这种趋同背后是政府和创业者的求稳心态，由此导致的问题是生产性产业多，服务于这些产业的新产业少，如中介组织、创意组织等，阻碍了产业链的建立。在转向乡村振兴阶段后，各类试点示范项目则因为“竞优”机制和短期性，地方更容易被诱导转向基础资源较好、可视性更强的短平快项目（Wang & Yang, 2021）。这使得试点普遍存在选择性偏差和霍桑效应（刘军强等，2018），即“有试点无示范”。如果将考察的时间拉长，会发现不同时期 B 县都在反复将资源投入几个核心村庄，并且将不同时期种类多样的政策目标都打包进入其中。目前来看，这种行为惯性依然非常明显，精准扶贫时期对其他区域和村庄的关注更像是一种例外行为。

模仿和趋同是组织重要的生存策略，也是在面对复杂政策环境和上级压力下的自我保护机制，其表面的无效率背后恰恰是组织的生存选择。然而，这种对内部效率（组织生存策略）的追求和外部效率（民众与企业）评价的脱嵌，使得组织看起来忙忙碌碌，实际上却无法解决当下乡村振兴政策与本地情境存在的抽离问题。正如百姓抱怨的“该做的不做，不该做的莽起做”。

六、突破“低水平均衡”：特殊地区的县域乡村振兴

如何才能突破“低水平均衡”，走向县域乡村振兴？宏观上，本文认为，需要同时改善乡村振兴政策领域的控制权结构和地方治理资源水平。在微观上，应着力增强县域政府对本地发展的统筹规划能力。县级单位是一种以县城为中心、乡镇为纽带、农村为腹地的行政区划型经济（杨晓军等，2018），其区别于市级行政单位的地方在于需要同时满足分散和聚集两种带有一定张力的发展需求。因此，县域发展的目标不应是一个微缩版城市，而是一个综合枢纽，是振兴乡村和构建新型城乡关系的重要平台。2021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提到“加快县域内城乡融合发展”，2022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则进一步细化到县域内的产业融合发展、县域富民产业和县域商业体系建设。可见，从顶层设计上，中央越来越重视县域经济作为一个有机体的发展潜力。本文对“县域”的强调也意在表明乡村振兴中乡村并非规划的基本经济单位，而是包括城镇在内的、“镇-乡-村”相互供给养分的复合型县域有机体。

而如前文提到的，人口的“域内流动”使该类地区的发展难以突破低水平均衡状态。在繁多的纵向制度安排、稀缺的地方治理资源及合法性压力下，县域层面呈现出某种主动或被动“失去自我”的状态。因此，要打破B县低水平均衡发展的现状，促进县域乡村振兴，急需“寻回县域”。本文提出如下建议。

一是在政策的地方性解释上“寻回县域”。B县有着丰富的文旅资源且离省会城市较近，文旅发展潜力大；但过去长期重复打造少数村庄也导致文旅资源的整合性差、多样性缺乏、过境游居多等问题。因缺乏对民间力量的统筹安排，一直没能县域内建立和文旅相关，并且可以发挥农业产业优势的产业链。因此，建议深度调研县域内人员务工、各类企业经营以及村庄定位，有针对性地通过信贷、税收、产业基金等政策打造相对完整的县域“文-旅-农”复合型产业链条。

二是在政策的地方性创新上“寻回县域”。面对人口“域内流动模式”带来的“低水平均衡”困境，需要对其一分为二来看待，要看到其相比“空心化”严重的地区存在的潜在人力资源优势和社会联结优势，将政策重点放在人力资本提升和转化上。结合建立县域复合型产业链条的需求，有针对性地支持有意愿的产业人才通过对口支援地区、兄弟县的交流渠道、个人（企业）渠道前往发达地区进行中长期“留学”，创新过去短期培训方式，加速技术、社会网络和理念的迁移。

三是在公共服务供给和产业平衡上“寻回县域”自己的时间节奏。

比如，B县地质灾害活跃，基础设施建设损毁率高，反向要求更高的工程质量和基建领域更多的维护性投入；然而，目前的资金越来越单方面偏向产业发展，在基础设施不完善的情况下发展产业犹如空中楼阁。片面强调县城和几个文旅村庄发展的代价是其他地区在公共服务供给优先级上的后退，长远而言，会加速县域人口流失，制约县域可持续发展，增加转型成本。因此，面对县域内有限的财政资源，需要精打细算，优先保障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对已经具备基础条件的优势文旅村庄和产业应放手给市场，扶持一批，自我发展一批，减少边际效益不高的重复性投资，抑制短期主义冲动，着眼于全域要素最优配置。

最后，要着力提升基层政府的综合治理权限和能力。县一级政府要切实提升战略规划能力，克服部门分利秩序，多倾听群众意见，结合上级要求，综合制定区域发展战略规划。此外，要强化县级部门对各类政策的解读和分析能力，特别是对非指标化的内容要加强对乡镇的指导，建立对乡镇单位结果导向的激励机制，减少因过去简单扶持个别乡镇村庄导致的绩效“默认格局”。要继续借鉴和改进脱贫攻坚时期城乡组织化帮扶机制，注重外部组织力量输入对“低水平均衡”恶性循环的干预作用。

参考文献

- 陈家建 (2022). “控制权”理论与政府治理: 一个研究评述. 学海, 5: 53 - 63.
- Chen, J. J. (2022). “Control Rights” Theory and Governance Studies: A Research Review. *Academia Bimestris*, 5: 53 - 63. (in Chinese)
- 陈锡文 (2018). 从农村改革四十年看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 行政管理改革, 4: 4 - 10.
- Chen, X. W. (2018). On the Strategy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ural Reform for 40 Years. *Administrative Reform*, 4: 4 - 10. (in Chinese)
- 杜姣 (2022). 乡村振兴背景下乡村留守精英及其组织化的公共参与路径. 中国农村观察, 5: 140 - 152.
- Du, J. (2022). Rural Left-behind Elites and Their Organized Public Participation Path in the Context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China Rural Survey*, 5: 140 - 152. (in Chinese)
- 尕丹才让、李志民 (2012). 藏区生态保护、资源开发与农牧民增收——以冬虫夏草为例. 西藏研究, 5: 114 - 120.
- Gadan, C. R., & Li, Z. M. (2012). Tibetan Ecological Protection, Resource Development and Farmers' Income: Taking Caterpillar Fungus as an Example. *Tibetan Studies*, 5: 114 - 120. (in Chinese)
- 何慧丽 (2012). 当代中国乡村复兴之路. 人民论坛, 31: 52 - 53.
- He, H. L. (2012). The Road to Rural Revival in Contemporary China. *People's Tribune*, 31: 52 - 53. (in Chinese)
- 贺雪峰 (2020). 城乡关系视野下的乡村振兴. 中南民族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4: 99 - 104.
- He, X. F. (2020). Rural Vitaliz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Urban-rural Relations. *Journal of South-Central Minzu University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4: 99 - 104. (in Chinese)
- 黄宗智 (2014). “家庭农场”是中国农业的发展出路吗? 开放时代, 2: 176 - 194 + 179.
- Huang, Z. Z. (2014). Is “Family Farms” the Way Develop Chinese Agricultural? *Open Times*, 2: 176 - 194 + 179. (in Chinese)
- 姜德波、彭程 (2018). 城市化进程中的乡村衰落现象: 成因及治理——“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视角的分析. 南京审计大学学报, 1: 16 - 24.
- Jiang, D. B., & Peng, C. (2018). The Phenomenon of Rural Declining in the Process of Urbanization: Causes and

- Governance: An Analysi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Implementation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Journal of Nanjing Audit University*, 1: 16 – 24. (in Chinese)
- 姜方炳 (2018). “乡贤回归”: 城乡循环修复与精英结构再造——以改革开放 40 年的城乡关系变迁为分析背景. *浙江社会科学*, 10: 71 – 78 + 157 – 158.
- Jiang, F. B. (2018). “Return of Local Worthies”: Urban-Rural Circulation Repairing and Elite Structure Reconstruction: Taking the Changes of Urban-Rural Relations in the Past 40 Years of Reform and Opening-up as Analysis Background. *Zhejiang Social Sciences*, 10: 71 – 78 + 157 – 158. (in Chinese)
- 李汉林、渠敬东、夏传玲、陈华珊 (2005). 组织和制度变迁的社会过程——一种拟议的综合分析. *中国社会科学*, 1: 94 – 108 + 207.
- Li, H. L., Qu, J. D., Xia, C. L., & Chen, H. S. (2005). Organizational and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and Change: A Social Process.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 1: 94 – 108 + 207. (in Chinese)
- 李棉管 (2019). 自保式低保执行——精准扶贫背景下石村的低保实践. *社会学研究*, 6: 188 – 212 + 246.
- Li, M. G. (2019). Self-protection Oriented Dibao Implementation: The Practice of Dibao in Village Shi during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in China. *Sociological Studies*, 6: 188 – 212 + 246. (in Chinese)
- 李小云 (2018). 冲破“贫困陷阱”: 深度贫困地区的脱贫攻坚. *人民论坛·学术前沿*, 14: 6 – 13.
- Li, X. Y. (2018). Break Through the “Poverty Trap”: Lift the Seriously Impoverished Areas out of Poverty. *Frontiers*, 14: 6 – 13. (in Chinese)
- 李长学 (2018). 论乡村振兴战略的本质内涵、逻辑成因与推行路径. *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 5: 13 – 18.
- Li, C. X. (2018). On the Essential Connotation, Logical Cause and Implementation Path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Inner Mongolia Social Sciences (Chinese Edition)*, 5: 13 – 18. (in Chinese)
- 刘爱梅 (2021). 农村空心化对乡村建设的制约与化解思路. *东岳论丛*, 11: 92 – 100.
- Liu, A. M. (2021). The Restriction and Solution of Rural Hollowing to Rural Construction. *Dongyue Tribune*, 11: 92 – 100. (in Chinese)
- 刘军强、胡国鹏、李振 (2018). 试点与实验: 社会实验法及其对试点机制的启示. *政治学研究*, 4: 103 – 116 + 128.
- Liu, J. Q., Hu, G. P., & Li, Z. (2018). Pilot and Experiment: Social Experiment and Implications for Pilot Mechanism. *CASS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4: 103 – 116 + 128. (in Chinese)
- 刘世定、邱泽奇. “内卷化”概念辨析. *社会学研究*, 05: 96 – 110.
- Liu, S. D., & Qiu, Z. Q. (2004). Analysis of the Concept of “Involution”. *Sociological Studies*, 5: 96 – 110. (in Chinese)
- 刘祖云、张诚 (2018). 重构乡村共同体: 乡村振兴的现实路径. *甘肃社会科学*, 4: 42 – 48.
- Liu, Z. Y. & Zhang, C. (2018). Reconstruction of Rural Communities: A Realistic Path to Rural Revitalization. *Gansu Social Sciences*, 4: 42 – 48. (in Chinese)
- 马戎 (2013). 我国部分少数民族就业人口的职业结构变迁与跨区域流动——2010 年人口普查数据的初步分析. *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6: 1 – 15.
- Ma, R. (2013). The Occupational Structure Changes and Cross-Regional Mobility of the Employed Population of Some Ethnic Minorities in China. *Journal of South-Central Minzu University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6: 1 – 15. (in Chinese)
- 乔家君、刘嘉俊、谢森 (2011). 欠发达农区村域空心化特征及其微观机理——以兰考县三个村为例. *人文地理*, 6: 98 – 102 + 160.
- Qiao, J. J., Liu, J. J., & Xie, M. (2011). Characteristics and Microcosmic Mechanism of Rural Hollow Villages in Less Developed Rural Area: A Case Study of Three Villages in Lankao County. *Human Geography*, 6: 98 – 102 + 160. (in Chinese)
- 孙学立 (2018). 农村人力资源供给视角下乡村振兴问题研究. *理论月刊*, 5: 128 – 132.
- Sun, X. L. (2018). Study on Rural Revitaliz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ural Human Resources Supply. *Theory Monthly*, 5: 128 – 132. (in Chinese)
- 田凯等 (2020). 组织理论: 公共的视角.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 Tian, K. et al. (2020). *Organizational Theory: A Public Perspective*.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in Chinese)
- 托马斯·皮凯蒂 (2014). 21 世纪资本论. 北京: 中信出版社.
- Thomas, P. (2014). *Capital in the 21st Century*. Beijing: CITIC Press. (in Chinese)
- 王立明、冶生梅 (2016). 牧区藏族的生产方式与国家立法规制——以青海省冬虫夏草立法规制为视角. 青海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1: 46–53.
- Wang, L. M., & Ye, S. M. (2016). The Legislative Ruling of the Living Custom of Tibetan: Focus on the Legislative Ruling of Cordyceps Sinensis of Qinghai Province. *Journal of Qinghai Minzu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1: 46–53. (in Chinese)
- 王浦劬、赖先进 (2013). 中国公共政策扩散的模式与机制分析.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6: 14–23.
- Wang, P. Q., & Lai, X. J. (2013). A Study on the Model and Mechanism of Public Policy Diffusion in China. *Journal of Peking University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6: 14–23. (in Chinese)
- 王雅军、张波 (2019). “农民职业化”与农村土地制度改革. 改革, 5: 126–133.
- Wang, Y. J., & Zhang, B. (2019). The Peasants' Professionalism and Reform of Rural Land System. *Reform*, 5: 126–133. (in Chinese)
- 王志章、杨志红 (2021). 贫而不困: 当下中国农村不存在贫困陷阱. 湖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 118–131.
- Wang, Z. Z., & Yang, Z. H. (2021). Poor but not Trapped: No Poverty Trap in Rural China at Present. *Journal of Hubei Minzu University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2: 118–131. (in Chinese)
- 魏后凯、姜长云、孔祥智、张天佐、李小云 (2021).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权威专家深度解读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 中国农村经济, 1: 2–14.
- Wei, H. K., Jiang, C. Y., Kong, X. Z., Zhang, T. Z., & Li, X. Y. (2021). Pushing Forward Rural Revitalization in an All-round Way: An In-depth Interpretation by Authoritative Experts of the Spirit of the Fifth Plenary Session of the 19th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hinese Rural Economy*, 1: 2–14. (in Chinese)
- 温铁军 (2018). 生态文明与比较视野下的乡村振兴战略. 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1: 1–10.
- Wen, T. J. (2018). The Rural Rejuvenation Initiative in the Perspective of Eco-civilization and Comparison. *Journal of Shanghai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1: 1–10. (in Chinese)
- 巫锡炜、毕忠鹏 (2022). 延续与变化: 从七普公报初探少数民族人口发展. 人口与发展, 1: 127–139+115.
- Wu, X. W., & Bi, Z. P. (2022). Continuity and Change: A Preliminary Study on the Population Development for Ethnic Groups from the Seventh Census.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1: 127–139+115. (in Chinese)
- 吴重庆、张慧鹏 (2018). 以农民组织化重建乡村主体性: 新时代乡村振兴的基础. 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3: 74–81.
- Wu, C. Q., & Zhang, H. P. (2018). Reconstruction the Rural Subjectivity by Peasants Organization: The Foundation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in the New Era. *Journal of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3: 74–81. (in Chinese)
- 萧洪恩 (2022). 乡村如何振兴: 中国农村就地现代化道路问题研究述论. 阅江学刊, 6: 116–126+170–171.
- Xiao, H. E. (2022). How to Revitalize the Countryside: A Review of the Study on the Road to Local Modernization in China's Rural Areas. *Yuejiang Academic Journal*, 6: 116–126+170–171. (in Chinese)
- 肖唐镖 (2006). 什么人在当村干部?——对村干部社会政治资本的初步分析. 管理世界, 9: 64–70.
- Xiao, T. B. (2006). Who Is Working as a Village Cadre: A Preliminary Analysis of the Social and Political Capital of Village Cadres. *Journal of Management World*, 9: 64–70. (in Chinese)
- 邢成举、李小云、张世勇 (2019). 转型贫困视角下的深度贫困问题研究——以少数民族深度贫困村为例. 民族研究, 2: 52–63+140–141.
- Xing, C. J., Li, X. Y., & Zhang, S. Y. (2019). A Study on Extreme Pover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ransitional Poverty: Taking the Extreme Poverty Villages of Ethnic Minorities as Examples. *Ethno-National Studies*, 2: 52–63+140–141. (in Chinese)
- 薛敏 (2022).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与乡村振兴的互动关系.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6: 45–51.

- Xue, M. (2022). Crossing the Middle-Income Trap and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Rural Revitalization. *Journal of Northwest A & F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6: 45–51. (in Chinese)
- 杨春华、姚逸苇 (2021). 何谓“农村空心化”?——一个结构化的概念分析视角. *农村经济*, 7: 79–86.
- Yang, C. H., & Yao, Y. W. (2021). What Is “Rural Hollowing”? *Rural Economy*, 7: 79–86. (in Chinese)
- 杨林 (2020).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需要持续用力久久为功. *甘孜日报*, 3.
- Yang, L. (2020). Implementing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Requires Sustained Efforts. *Ganzi Daily*, 3. (in Chinese)
- 杨晓军、宁国良 (2018). 县域经济: 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支撑. *中共中央党校学报*, 6: 119–124.
- Yang, X. J., & Ning, G. L. (2018). County Economy: An Important Pillor for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Journal of the Party School of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 P. C. (Chinese Academy of Governance)*, 6: 119–124. (in Chinese)
- 叶兴庆、翁凝 (2018). 拖延了半个世纪的农地集中——日本小农生产向规模经营转变的艰难历程及启示. *中国农村经济*, 1: 124–137.
- Ye, X. Q., & Weng, N. (2018). Farmland Concentration with Half a Century Delay: A Difficult Conversion from Small Scale to Large Scale Farming in Japan and Its Implications. *Chinese Rural Economy*, 1: 124–137. (in Chinese)
- 郑长德 (2020). 深度贫困地区跨越“分形贫困陷阱”的路径与政策支持研究. *经济研究参考*, 12: 18–30.
- Zheng, C. D. (2020). Research on the Path and Policy Support to Cross the Fractal Poverty Trap in Deep Poverty Areas. *Review of Economic Research*, 12: 18–30. (in Chinese)
- 朱光磊、裴新伟 (2021). 中国农民规模问题的不同判断、认知误区与治理优化.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6: 127–138.
- Zhu, G. L., & Pei, X. W. (2021). The Scale of Chinese Farmers: Different Judgments, Cognitive Misunderstandings and Governance Optimization. *Journal of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6: 127–138. (in Chinese)
- 周飞舟 (2006). 从汲取型政权到“悬浮型”政权——税费改革对国家与农民关系之影响. *社会学研究*, 3: 1–38.
- Zhou, F. Z. (2006). Rural Fee Reform and the Changing Relationship Between State and Peasant. *Sociological Studies*, 3: 1–38. (in Chinese)
- 周立、李彦岩、王彩虹、方平 (2018). 乡村振兴战略中的产业融合和六次产业发展. *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3: 16–24.
- Zhou, L., Li, Y. Y., Wang, C. H., & Fang, P. (2018). Development of Industrial Integration and Sixth Industry in Rural Vitalization Strategy. *Journal of Xinjiang Normal University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3: 16–24. (in Chinese)
- 周雪光、练宏 (2012). 中国政府的治理模式: 一个“控制权”理论. *社会学研究*, 5: 69–93+243.
- Zhou, X. G., & Lian, H. (2012). Modes of Governance in the Chinese Bureaucracy: A “Control Rights” Theory. *Sociological Studies*, 5: 69–93+243. (in Chinese)
- Holcombe, A. (2017). Can China Reduce Entrenched Poverty in Remote Ethnic Minority Regions? Lessons from Successful Poverty Alleviation in Tibetan Areas of China During 1998–2016. *Ash Center Policy Briefs Series*.
- Meyer, J. W., & Rowan, B. (1977). Institutionalized Organizations: Formal Structure as Myth and Ceremony.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83(2), 340–363.
- Wang, S., & Yang, D. Y. (2021). Policy Experimentation in China: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Policy Learning. *NBER Working Papers*.

责任编辑: 张书维